

丹·布朗小说的伦理抉择

朱振武

内容摘要：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实践对欧美乃至世界文坛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与他对当下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入考察和深刻关怀密不可分。从处女作《数字城堡》到成名作《达·芬奇密码》，再到新近出版的《地狱》，丹·布朗在其六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从未放弃过对现实伦理问题的积极思考。他不仅尊重并因循小说读者的伦理需求，讨论当下诸多难以抉择和评判的人类共同面对的社会伦理和自然伦理，还打破二元对立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握书写伦理，拿捏书写尺寸，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伦理问题的洞见，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可以说，丹·布朗的小说创作是对后工业化语境下人类遭遇的生存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揭示和诠释，是对现实社会中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宗教伦理和行为伦理等当下热点问题的有力揭橥。

关键词：伦理抉择；《达·芬奇密码》；生态伦理；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朱振武，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文化、英美小说美学及文学翻译方面的研究。

Title: Ethical Choice of Dan Brown's Literary Imagination

Abstract: Dan Brown's novels have had active impact on world literature. This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as well as profound concern for today's world. From his debut *Digital Fortress* to his masterpiece *The Dan Vinci Code* and to the newly-published *Inferno*, he has never ceased contemplating realistic ethical problems. Not only has he shown his respect for the reader's ethical needs, but has also deconstructed the dual opposition in an appropriate fashion. In this way, he has expressed his unique ethical insight and proposed his own resolution. Brown's novels have exposed man's survival crisis and faith crisis as well as moral crisis in a context of post industrialism. Moreover, they also touch upon such widely discussed issues as ecological ethics, sci-tech ethics, religious ethics and behavior ethics.

Key words: ethical choice; *The Dan Vinci Code*; ecological ethics; dual opposition

Author: Zhu Zhenwu,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special professor of the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nd dean of the Cent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CELC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aesthetics of the novel,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fredzzw2002@163.com

一部文学作品到底在哪些方面吸引和打动着读者，其成功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评论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作家竭力探求的堂奥。美国著名作家丹·布朗的名

作《达·芬奇密码》问世十一年，其中文版也已经畅销整十载，全球销量接近一亿册，从畅销书到常销书，不光是弄得个洛阳纸贵，还仿作频出，形成一股文化悬疑小说的潮流，其影响更从小说界渗透到文化界等不同领域，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伦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吃惊地发现，作者丹·布朗在其全部六部小说的创作中，竟然一以贯之地对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深层的伦理思考。的确，文学想象离不开社会现实，当下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来就是伦理问题的催化物，而特定的伦理规范也自然就成了丹·布朗展开小说情节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对伦理问题的探讨和思考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丹·布朗关注的一个重心，甚至成为一种目的。正如蔡元培所说，“伦理学在乎行为的目的，就是行为的原理。所以伦理学所研究的，就是人类意欲，当以何为目的之问题”（226）。丹·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也是在“以何为目的”引导下的产物。它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价值意义和精神文明的旨归发出质疑，并以构建正确的伦理道德为己任。

唯读者马首是瞻的伦理指向

哈特曼在其《伦理学》中提到伦理学的任务时说，它“从一般意义上揭示出什么是善，它寻求的是在实证道德中所缺乏的善的标准”（转引自万俊人¹）。文学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可以说，文学作品实际是对现实中伦理体系中所需要的道德的一种引导和补偿。《达·芬奇密码》等系列文化悬疑小说的作者丹·布朗显然意识到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未来的尴尬境地等诸多问题，于是针对这些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人文现状与人类命运提出自己的伦理架构，并通过文学想象阐发了自己的伦理思考。恰如我国古籍《淮南子·齐俗训》所言：“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转引自蔡元培²）。丹·布朗的小说创作正是现代社会多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这种精神救助。作者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道德灰色地带展露无遗，然后将读者引领到这个灰色地带，让其感受并反思道德的两难境地。当然，尽管作者在创作中对伦理的关怀始终如一，但其伦理思考却呈现出波动状态。丹·布朗的这种创作动机在其前后期作品中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待见，这主要是读者的现实伦理需求与小说中所体现的伦理立场与关怀相龃龉的结果。

丹·布朗依据社会现实选择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并将之融入作品之中，而这些预设了的伦理问题常常具有偶然性的一面。他的文学之路就始于对身边偶然发生的伦理事件的思考，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数字城堡》就是这样诞生的。两名来自美国安全局的特工到他任教的大学逮捕了一名大学生，理由是这名大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事实上，这学生只不过用学校的电脑发了封中伤美国政府的邮件。对于这次美国政府干预个人隐私一事，丹·布朗感到既震惊又愤怒，并随即开始不断收集有关国安局的各种资料。“他对这个鲜为人知的机构了解得越多，对国民安全和公民隐私之间的矛盾思考就越深刻”（Rogak 45），遂将这一伦理矛盾用文学想象展示出来，最终构建了这部小说的雏形。在创作随后的几部小说时，他对触发自己灵感的伦理问题展开想象，起初是模糊地表达自己的伦理倾向，很快就努力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

然而偶然之中其实往往蕴含着必然，丹·布朗文学创作中有关伦理问题的选择也是如此。“西方文学和伦理思想的历史表明，远到古代希腊的文学，近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伦理学影响文学和文学表现道德都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聂珍钊 杜娟等¹），因而撇

开现实中所遭遇的偶发伦理事件的启发,丹·布朗也会按照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去表现自然、社会和历史,去建构自己的文学想象,这正是丹·布朗将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创作之中的必然性。他选定的伦理问题通常具有当下性和争议性。《数字城堡》探讨信息时代下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的问题,《天使与魔鬼》以反物质为线索探讨科学与宗教之争,《骗局》从总统大选的角度探讨政治问题,《达·芬奇密码》从艺术作品出发思索当下人们的信仰危机,《失落的秘符》对人性与神性的关系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等问题进行诠释,《地狱》则对当下人口过剩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做出伦理上的抉择。丹·布朗采用这些当下人们关心且具有争议的伦理问题作为写作素材,其命意显然在于激发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但他很快就懂得了这一点,即要想让更多读者参与这一思索的过程,还需要让其创作动机赢得读者的认同,要符合读者的伦理诉求。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意义的建构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活动。由于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聂珍钊²),因而读者在建构文本意义时必然会和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价值理念产生碰撞。读者与作者间的这种互动可能对作品的命运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当读者的现实伦理需求在小说中得不到回应或者得到的是相反的价值评判时,读者就很难与作者产生共鸣,其结果之一就是其作品不受读者欢迎。以《骗局》为例,该小说主要围绕一场精心策划的科学骗局展开,来揭露美国大选中诸如性丑闻、行贿受贿、政治谎言等种种政治黑幕,小说中所反映的官场腐败与当时美国民众的现实伦理需求拉开了距离。该小说于2001年8月上市,次月便发生了“9·11”恐怖事件。在一片恐慌之中,美国人的爱国情绪高涨,他们想要看到的是美国政府以及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积极的一面,而非一个道德败坏的政府和前途未卜的国家。此前的《数字城堡》和《天使与魔鬼》两部作品在当时也未引起多大关注的原因其实也差可比拟。时运不济和作品受众面的狭窄,使丹·布朗不得不深思在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又兼顾其现实伦理需求。

鉴于此,丹·布朗在创作此后的三部小说时更好地做到了写给大众看,积极与读者的现实伦理需求靠拢,并向读者传递伦理正能量,结果赢得了成功。他意识到文学创作并不是写给自己的,不是自娱自乐的,不能只是一味实验自己的创作技巧或手法,不是一味地自我陶醉,而是更多地从读者出发,考虑读者的接受习惯和阅读方式,特别是其变化着的审美情趣。《达·芬奇密码》“借侦探小说的形式重新解读达·芬奇名画中潜藏的异教异端信息,从而在基督教传统压抑缝隙中发掘更加悠久的女神宗教的信仰和信念”(叶舒宪⁶¹),结果是这部小说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不少读者的伦理诉求和内心祈愿。尽管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离真正的现实尚有距离”(Bock²),但这无可厚非,因为没有人会在写历史时有意捏造事实,除非是在读者已知的想象王国里(Lobdell²⁸)。《失落的秘符》也不例外。这部作品借用宗教和科学这两把智慧的钥匙,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之中找寻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为沮丧的人们重新掇拾起失落的信心。尽管此书在出版时刚好遇到美国金融危机,但其销量却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原因之一在于作品对于人性的肯定符合危机下人们需要重拾信念的伦理需求。而新作《地狱》则带领读者重新思考了人类发展的问题。面对这些生态危机,读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会趋使他们自觉偏向一个较为积极的结局,而《地狱》就很好地迎合了读者这种心理。作品在指出人口这一复杂话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伦理矛盾的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臭氧消耗、水源缺乏和空气污染都不是疾病——它们只是症状。而病根是人口过剩。除非能正视全球人口问题,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快速扩散的恶性肿瘤上贴一张创可贴”(127)。丹·布朗充分利用

文学想象,将“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伦理选择结果留给读者去构建,让读者在读完作品之后仍回味无穷(朱振武 束少军 53)。可见,读者现实的伦理需要影响着丹·布朗的创作,使之在创作中对伦理元素的整合朝着积极的方向开展,尽力呈现人性和美好的一面。

“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书写

“文学伦理学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既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聂珍钊 3)。后现代伦理环境是丹·布朗从事文学想象的背景板,他主要是通过采用一些后现代叙述手法,如戏仿、多视角及多线叙事等来呈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现代道德世界。恰如现代小说《黑暗之心》和《背德者》等“在无尽的美感之中蕴含着伦理难题”(Ellison 159)一样,丹·布朗的小说在后现代的叙述手法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于当下人们伦理境况的忧患意识。

后现代的伦理世界首先是一个宏大叙事遭到质疑的世界。作家们运用戏仿手法和开放性结构对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发出质疑,对传统进行解构。丹·布朗作品中同样体现了晚期后现代写作特色,他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互文性的运用来达到对宏大叙事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巧妙的互文不仅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更重要的是质疑了支撑这些传统文化背后的权威信念。《达·芬奇密码》就充满了对经典文化的颠覆式使用。提彬在给兰登和索菲亚讲解《最后的晚餐》时,将耶稣的十三个门徒解读为十二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并称耶稣只是一个有着妻儿的凡夫俗子。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丹·布朗在处理此类素材时,也遭遇极大的困惑,但他渐渐明白,“当人们阅读和阐释历史时,并不是在阐释历史的真实面目,只是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没有人能够回答如何保证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但它并不阻止人们对历史的询问”(Rogak 85)。这样看来,他对耶稣神性所做的新历史主义的解读就可以视为对基督教所宣传的权威叙事的解构。可以说,《达·芬奇密码》彻底颠覆了作为男权象征的男性基督,并将之还原为女神形象。作者在对历史的解构中转变了立场,置换了源文的义理,并赋予其另类意义,从而对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和女性伦理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丹·布朗的新作《地狱》也与文学经典形成互文,其书名就借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的篇名,具体情节更是多处引用但丁《神曲》原文作为人物话语和解密线索。通过对但丁的《地狱》的解读,作者将病毒的肆虐比作一场通往天堂的地狱之旅和必经之路,从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欧洲鼠疫这一历史事实。他将笔下的佐布朗斯特发明的病毒和欧洲鼠疫相对照,暗示了自然爆发的洗礼力量,从而对人类中心地位发出了质疑。在人文主义发源之地意大利,作者把过去与现状对比,将历史和现实融合,让人们重新思考了在自然面前“人文”的真正意义。丹·布朗用想象再现历史,并从全新视角对传统文本进行再度解释,在当下与过去的交织中颠覆着传统思想,进而取得了伦理问题的新见地。

由于后现代世界里的人们实行的是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道德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成了个人化的行为实践,这就赋予了后现代伦理一种相对主义的色彩。丹·布朗在创作中摒弃平铺直叙,经常人为地中断叙事,从时间的连续中断裂出来转向空间的并置,通过多线叙事展示多种并行的个人化道德实践,让其各抒己见,而开放式结尾则意味着作者将这些个人化道德实践的评判留给了读者。丹·布朗的近作《地狱》就以复调的历史伦理叙事形式展开,其文本内部彼此分离而又相互呼应,形成不同故事之间彼此“对话”和互为阐释的局面。以贝特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观点,主张为了一批人活着而杀死另一批人。这种观点

看起来残忍，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就如其支持者西恩纳所举的例子一样，医生为了救人而必须做截肢手术一样，杀人只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另一观点是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义务论支持者，重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因而，他们极力反对用非人道的方法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两派的观点都有可取与不可取之处，丹·布朗让这两派人在各自的叙事线上阐述各自观点，连一向机智的兰登也陷入了深思之中。这样，道德个人化造成的道德判断难题就在多线叙事策略中得到了彰显。事实上，丹·布朗直到故事结束也没有偏向任何一方，而是将最终的裁判权交给了读者。丹·布朗就这样通过大量文学经典、历史掌故、文化隐喻的运用和相关密码的重重设置，为读者展现了一座座伦理迷宫，并辅之以互文、反讽、文本化以及多线叙事等表现手法恰当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伦理境况。

如果说《数字城堡》是科技惊悚小说，《骗局》是政治惊悚小说，《达·芬奇密码》是宗教惊悚小说，《天使与魔鬼》是文化惊悚小说，那么2009年问世的《失落的谜符》和2013年问世的《地狱》，则是思考和关注人类未来生存状况的生态惊悚小说。生命伦理和自然伦理孰重孰轻的问题，是文学家们由来已久的困惑。威廉·福克纳在创作中篇小说《熊》时，也体现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类自身未来的关注，揭示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神秘的联系，并传递了对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焦虑。丹·布朗则进一步思考了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在《地狱》中，他突出描写人文建筑，却相对减少对于自然景观的描摹，个中深意可能正如美国学者兼环保人士比尔·麦吉本所称，“我们现居的世界是个后自然世界……我们所知的自然正在逐渐淡出人类的视野”（Mazel 29）。丹·布朗在《地狱》中借贝特朗·佐布朗斯特之口阐发了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以及人口过剩将会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如洁净饮用水的短缺、全球表面温度的升高、臭氧的损耗、海洋资源的消耗、物种的频繁灭绝、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森林的过度砍伐以及全球海平面升高（126），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人类如果不能尽快消除当前生态危机，生态系统崩溃的那一天也就为期不远了，人类就会与地球一起陷入灭顶之灾。不仅如此，丹·布朗在用眼花缭乱的科技元素“包装”小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科技忧思。实际上，从前的小说界并不缺少对科学进行这样观照的作家，只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这方面的贡献而已。爱伦·坡早在一百六十年前，就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和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等问题给予了深层关注和揭示。其后的不少文学大家也都曾把对科学技术的忧虑融入其作品，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冯尼格特的《猫的摇篮》、德里罗的《白噪音》、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等都莫不如此。“科学发现所带来的每一种突破性的技术都被应用在了武器上——从简单的火到核能——而且几乎总是掌控在那些强权政府的手中”（409）。丹·布朗的作品也传达了这样的隐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恩娜才如此奋不顾身地抢在他人之前找到病毒，以免政府将病毒用于人类战争。当然，他又较为理性地主张正确使用科技，以帮助人类可持续发展。如小说中佐布朗斯特将科技视为生物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认为科技合乎自然法则，并应该应用于人类的进化过程，以减缓人和自然的矛盾。

可以看出，丹·布朗既不是完全否认科技，也非全盘接纳科技。在探讨科技伦理的同时，丹·布朗还指出了医学伦理的冲突和矛盾。由于医学直接影响着生命个体的存亡，医学技术将有可能直接帮助人类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进化成为超人类，让人类变得更健康长寿，但这也意味着一部分人将被自然淘汰。“合法的基因增强会立刻创造出一个富人和穷人的世界，那将是一种必然会滋生出奴隶社会或者种族清洗的局面”（269）。丹·布朗预测了医学技术草率使用的后果，指出了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以及

种族伦理问题,揭示了现代社会整个人类的伦理困境和生存梦魇。

聚焦现世冲突的伦理关怀

丹·布朗的六部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书写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冲突,并在主旨层面上传递了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进而传递出其生态、科技、医学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伦理指向,表达了一种矛盾的但又温和中庸的伦理观。他对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其创作更具深度和意义,而其写作尺度的恰当拿捏和融俗入雅、雅俗同炉的美学营构则使作品彰显出少有的大俗大雅。读者在其作品中看不到血腥暴力的凶杀场面和低俗生硬的性爱描写,取而代之的是环环相扣的悬疑案件和自然而然的情感发展。在伦理判断上,作者更是恰到好处地把握分寸,并适量地给读者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就曾在其后现代叙事经典作中倡议,“作者从来就不应说教。即使是在有明显道德或哲理目的的故事中,也永远不应露骨地说教”(Currie 21)。与灌输自己的伦理观相比,丹·布朗更加注重将伦理冲突视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助推器,将之视为折射美国当下社会及乃至整个人类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的三棱镜。

丹·布朗的小说首先是探讨个人与国家职能机构间的关系。社会契约论的坚定鼓吹者卢梭在自己的著述中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契约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权威,以适当地保护我们的权利”(麦金太尔 214)。国家作为这个权威的代表,有时却和个人利益相对立。而这“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成为了美国每个时期的写作特色。这一主题几乎是美国文学的专利,但这也是美国文学中最难处理的主题之一”。丹·布朗没有避讳这一伦理问题,而是在作品中展开了相关探讨。他在几部小说中都涉及到某种隐形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肆意地介入公民个人生活。进入后工业时期后,人们开始质疑契约的合法性,国家究竟是在保护还是在侵害公民的自然权利?因而,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于权威的质疑,主要体现为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在《数字城堡》里展露得最为充分。作品中的远诚友加曾是国家安全局里的密码解密员,因在万能解密机使用权限上与国安局产生分歧而愤然辞职。他认为,无限制地使用万能解密机是对公民隐私的任意践踏。他那句“谁来监管这些监管者”的座右铭是对政府不信任的最好书写,也是对最近出现的“棱镜门事件”的超前摹写。公民要求获得绝对的隐私自由,而政府为保护多数人的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却要侵害其公民自由。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虽然丹·布朗在其小说中更倾向于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或政府一方,但他还是希望能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除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也是丹·布朗关注的伦理矛盾之一。家庭本是一个和谐融洽的地方,但在丹·布朗的笔下,家庭几乎总是残缺不全,家庭关系也总是处于剑拔弩张之际。《骗局》中塞克斯顿父女、《失落的秘符》中的所罗门父子以及《达·芬奇密码》中索尼埃和索菲祖孙女等都是如此。这些残破的家庭中,母亲角色的缺失与隐退是其共同点之一。以《骗局》为例,女主人公雷切尔的母亲在家中曾是传统家庭美德的化身,是维系貌合神离的父女关系的唯一纽带。从某种程度上说,母亲角色的缺失是导致个人与家庭伦理冲突的重要原因。在《达·芬奇密码》中,苏菲对圣杯的追寻,其实就可视为对抹大拉这一母亲形象的追寻。这种追寻就是对现实中父权制主导下价值观念的反抗。因此,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是丹·布朗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德莱赛的《嘉莉妹妹》曾指出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沦为商品的悲剧，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单纯和谐关系的打破。同样，重新审视女性，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态，也是丹·布朗作品在当下阅读的一个启示。

丹·布朗还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伦理问题做了探讨。其中个人与他人的对立常常表现为各自信仰的不同。在这个多元时代，人们所面临的信仰问题与从前有所不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伤痛之一便是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于是乎有了“迷惘的一代”和稍后的“垮掉的一代”，于是乎也有了众多反应现实中信仰破灭的作品。丹·布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一些有着偏执信仰的人，如《达·芬奇密码》中的塞拉斯与提彬、《天使与魔鬼》中的教皇内侍与科勒、《失落的秘符》中的迈拉克以及《地狱》中的贝特朗等。在《天使与魔鬼》中，科学与宗教两种信仰间的冲突尤为突出。看得出，作者主张的是一种中庸的相容的信仰观，各种信仰在终极目标上都有其共通之处，因此应当彼此尊重和理解。此外，个人与他人利益冲突还体现在对生命权的取舍上。《地狱》便是对这一伦理问题最好的演绎。科学家贝特朗认为人类应当经过地狱的洗礼才能升入天堂，认为自己制造的病毒“地狱”是“留给世人的礼物，是未来，是救赎”（4）。这种病毒能使三分之一的人口丧失生育功能，意味着部分人类要牺牲自我繁衍的机会来争取人类更加长久的发展。丹·布朗在此提出以少救多的办法其实是遵从了“长远利他主义”的思想，即一种超出亲属和群体以作为保持“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和可能性”的手段（Love 156），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整体利益。斯宾塞认为，“自我牺牲的行为也是生物自然本能的延伸，人类为了发展自己的社会不能没有牺牲。行为的公正应当既包含利己，也包含利他”（宋希仁 415，416）。因此，丹·布朗实际是在“和解”利他和利己之间的伦理冲突。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早已不能简单地用善或恶来区分。“与洞悉事物或运动的恒常特性不同，我们无法对人或人的行为价值做出判断”（万俊人 2）。丹·布朗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在其文化悬疑小说中消解了善与恶之间往往被认为是很清晰的那条界线，将人的两面性同时呈现出来，从而回避了一种建立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原则上的伦理体系。他“接受矛盾，拒绝非此即彼的看法，这是后现代派最常重复的公式之一”（Bercovitch 468）。在《天使与魔鬼》中，教皇内侍这一几乎完美的英雄形象，竟然是那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将反物质带入梵蒂冈，残忍指使黑煞星杀害四名主教，并且还投毒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但读者却很难对教皇内侍心生厌恶之情，因为他之所以想利用反物质来制造危机并杀害主教，主要原因在于自己坚定的信仰，其恶中善的一面由此可见一斑。同《达·芬奇密码》中的塞拉斯、《骗局》中的皮克林、《失落的秘符》中的迈拉克、《数字城堡》中的远诚友加以及《地狱》中的科学家贝特朗一样，他们都是为着善的目的做着恶的事情，而并非是知其恶而为之。《地狱》给许多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是这样。走火入魔的极端科学家贝特朗是个已如上述，而一向不顾道德原则从事欺骗行径的“财团”组织的教务长也不是一恶到底或一善而终。他在关键时刻良心发现，悬崖勒马，甚至反戈一击，为人类未来命运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善是恶，他们对人类命运都有着深深的关切，从而填平了善恶之间的那道沟壑，正如鲍曼所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24）。丹·布朗正是通过这样的反讽策略，描摹了当下社会伦理的模糊境况。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关注现实，往往传达出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看到，丹·布朗在这一点上也毫不例外。仅在其第六部小说《地狱》中，丹·

布朗就对道德伦理、行为伦理、生态伦理、医学伦理和生存伦理等诸多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且相当专业的探究。他在六部文化悬疑小说中始终尊重读者的伦理需求,对当下诸多社会矛盾给予了深切关怀,并恰当地运用后现代书写元素阐释社会伦理问题,像中国古代人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家那样也做到了“文以载道”,做到了“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正如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展现了现实的残酷与希望的力量,詹姆斯·帕特森的《1号死亡》揭露了美国上流社会背后的阴暗、丑陋和变态,麦克·尤恩的《赎罪》书写人在遭受心灵谴责后道德的赎罪一样,丹·布朗的小说也对目下存在的诸多伦理问题和人们在伦理面前的矛盾心理进行了深刻揭示和阐发。作者聚焦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人们的生存困境和发展危机,并试图在更广阔的时空中为人类寻觅摆脱伦理困境的路径。他的作品摒弃了二、三十年前的某些极端作品以戏仿、拼贴、恶搞等文字游戏相高的风气,也摆脱了一味歪曲、颠覆、篡改或俗化文化符号、历史知识或英雄人物的浅薄庸俗作法。在“跨过雅俗之界,展现了纯粹文学与小说的相互渗透性”(Milner 291)的英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之后近两百年,丹·布朗再次引领雅俗合流之风,预见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甚至其自身的不和谐,用虚构的形式将现实中令人困扰的诸多伦理问题生动真实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阅读的欢愉中获得某种体认和领悟。丹·布朗所创作的这种看似通俗实则严肃的文学作品不光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还超越了阶层的局囿,具有了一种深厚的普世关怀,并从伦理层面为当下的社会发展和人文建设提供了参照。

注解【Notes】

按照英文版出版顺序,这六部小说依次是:《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 1998)、《天使与魔鬼》(*Angels and Demons*, 2000)、《骗局》(*Deception Point*, 2001)、《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 2003)、《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 2009)和《地狱》(*Inferno*, 2013),汉译本的出版顺序依次为:《达·芬奇密码》(2004)、《数字城堡》(2004)、《天使与魔鬼》(2005)、《骗局》(2006)、《失落的秘符》(2010)和《地狱》(2013)。

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丹·布朗:《地狱》,路旦俊 王晓东译,朱振武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只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See Gail McDonal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00-1960* (Routledge: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17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Bauman, Zygmunt. *Postmodern Ethics*. Trans. Zhang Chengg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Bercovitch, Sacv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 7. Prose Writing 194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Bock, Darrell L. *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Inc., 2006.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Cai Yuanpe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House, 1996.]

- Currie, Mark.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 Ellison, David.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European Modernist Literature: From the Sublime to the Uncann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 Lobdell, Jared. *The Rise of Tolkienian Fantasy*. Chicago: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Love, Glen A.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 2003.
-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年。
- [MacIntyre, Alasdair.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Trans. Gong Qu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 Mazel, David. *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 Athens: The U of Georgia P, 2000.
- Milner, Andrew.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聂珍钊 杜娟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Nie Zhenzhao and Du Juan, et al.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07.]
- Rogak, Lisa. *The Man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an Brown*. Kansas City: Andrews Mcmeel Publishing, 2005.
-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Song Xir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s*.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3.]
- 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伦理学主题：价值与人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Wan Junren, ed. *Classics of 20th Century Western Ethics. Subjects: Value and Life*.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4.]
- 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1 (2005): 59-69。
- [Ye Shuxian. “Who Broke The Da Vinci Code?” *Dushu* 1 (2005): 59-69.]
- 朱振武 束少军：“丹·布朗《地狱》的伦理之思与善恶之辩”，《外国文学动态》6 (2013): 51-53。
- [Zhu Zhenwu and Shu Shaojun. “Dan Bown’s Ethic Thoughts and Criterion of Good and Evil in *Inferno*.” *Foreign Litera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6 (2013): 51-53.]

责任编辑：王树福